

《白鹿原》中鄉土社會與 現代理性的糾纏

• 謝迪斌

費孝通把傳統中國農村稱為「鄉土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對傳統社會的鄉土性進行顛覆，並構建理性社會的過程^①。陳忠實的著名長篇小說《白鹿原》^②（引用只註頁碼）從文學的角度描述了這一過程，其故事發展的內在動力就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理性轉換的矛盾與衝突的內在張力；通過對這種矛盾衝突的展示，再現了中國近百年來的鄉土社會文化消解和現代理性構建的艱難與反覆的歷程。對這一小說進行社會學的文本分析，有助揭示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

一 白鹿原：鄉土社會的標本

小說從描述頑強的生殖衝動與父權意識開始，將白鹿原以一個典型的鄉土社會鏡像呈現在讀者面前。對生殖的崇拜是前現代社會的共同特徵，而強烈的父權意識，則是中國鄉土社

會的特有個性。在小說中，陳忠實塑造了白鹿原社會中三個最為典型的人物形象：族長白嘉軒，關中大儒朱先生和長工鹿三。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鄉土社會結構的主要支點。他們分別代表了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關係、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和農耕為主的生產力。他們三人的活動空間分別是：祠堂、書院、

陳忠實塑造了白鹿原社會中三個最為典型的人物形象：族長白嘉軒，關中大儒朱先生和長工鹿三。他們分別代表了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關係、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和農耕為主的生產力。



《白鹿原》書影

鄉土社會是一個充滿着神秘與魔幻色彩的社會。這是由於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與本身命運的把握程度低，生命的脆弱強化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鄉土社會必須確立與強化解除這種恐懼與焦慮的符號體系。

馬號(馬圈)。他們分別是鄉土社會的制度資源、精神資源、物質資源的生產者和再生產者，而這三種資源是中國鄉土社會得以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前提。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形成了中國鄉土社會的超穩定系統。

(一) 白嘉軒：鄉土社會的制度支柱

家族制度是鄉土社會的制度主體。白嘉軒一生致力於這一制度的繼承、維護與傳承。他的父親是族長，他自己也當了一個成功的族長，並把兩個兒子都培養成了族長。家族及其制度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內在本質與外在表現形式。正是有了成千上萬白嘉軒式的人物，中國的鄉土社會才能長期穩定。白嘉軒通過以下幾種手段來鞏固和維護鄉土社會的家族制度。

一是提供公共空間。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社會群體的認同與歸屬是在一種共同的空間中形成並不斷強化^③。白嘉軒一生努力營造這種公共的空間，那就是祠堂。田福賢和鹿子霖曾經這樣嘲笑白嘉軒：他一輩子就知道在祠堂內弄事，他自己在祠堂內弄事，還教會他兒子在祠堂內弄事。確實如此，白嘉軒一生的最大舞台就是祠堂。祠堂是鄉土社會制度與權威的象徵。白嘉軒以族長身份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修祠堂。祠堂重修以後，白鹿原的集體活動都在這個空間中展開。在這一空間中，白鹿原全體鄉民心靈上有了溝通，情感上有了認同，規範上有了統一。

二是建立符號體系。一個集體必須在一個特定的符號體系上形成共同的心理認知，並以這些符號來消除和

緩解家族成員的心理焦慮和恐懼。鄉土社會是一個充滿着神秘與魔幻色彩的社會。這是由於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與本身命運的把握程度低，生命的脆弱強化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鄉土社會必須確立與強化解除這種恐懼與焦慮的符號體系。

小說描述了白嘉軒確立的三個符號的重要作用。其一是他在祠堂上高高掛起的那塊「仁義白鹿村」石匾，這是給全體家族成員提供的最為權威的符號，是白鹿村的外在形象，同時它也必須內化為全體家族成員的內在行為邏輯。

其二是鎮壓鹿三的兒媳田小娥亡靈的六角形磚塔。當人們對田小娥在原上肇事的靈魂恐懼不安時，白嘉軒在朱先生的指導下，修建了這座磚塔，從此鬼神消失，人人平安。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說過，人們最大的恐懼在於恐懼本身^④。所以當這種象徵符號建立起來後，人們對恐懼的恐懼也就隨之消失，內心恢復寧靜，村莊也就歸於平靜。

其三是族譜。白嘉軒將重修族譜作為白鹿原上的一件重大事項來處理，建立一個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亞符號體系。在這一亞符號體系下，全體家族成員各安其位，強化了家族的認同與歸屬感。

三是舉辦儀式。白嘉軒主持的儀式以功能劃分，有四種不同的形式：其一是以自然為對象的儀式。通過一定的程序，實現人與自然的對話，從而改變自然運作的某些規律，達成人的某些目的。在一個以灌溉農業為主要特徵的鄉土社會中，以自然為對象的儀式主要表現為拜龍求雨^⑤。白嘉軒主持了一場盛大的求雨形式，以歌

唱和舞蹈的形式(實際也是一種特定的符號)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的溝通機制,從而讓自然給白鹿原普降甘霖,救民於水火。

其二是以亡靈為對象的儀式。在鄉土社會中,祭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意義在於,通過一系列固化程序與內容,構建一種人與亡者之間的溝通機制。這一機制有兩種功能:一是把在生者的訴求傳達給亡靈,並祈求亡靈協助達成這些訴求;二是家族成員或代表在亡靈面前許下一些承諾,這些承諾實際上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規則和道德要求,家族成員在這些亡靈(主要是祖先)面前許下承諾,意味着全體成員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遵守這些承諾,否則就會受到亡靈的懲罰。白嘉軒把祭祀儀式搞得非常隆重,就意味着白鹿原這個典型的鄉土社會的全體成員在「死人」的巨大權威面前,進行了莊嚴的宣誓,承諾維護現在的社會道德秩序。

其三是對鄉民的懲戒儀式。如果說前面所說的祭祀是一種承諾與宣誓的話,那麼懲戒就是對沒有踐行自己的承諾、違背了自己誓言的人與事的審判。所以它必須在當時許下諾言和進行宣誓的地方——祠堂裏舉行。小說中多次出現這一儀式的場景,其中最為典型的的就是對白嘉軒的兒子白孝文的懲罰——白孝文與田小娥通姦,違背了鄉土社會的公序良俗。白嘉軒主持這一儀式,撤消了白孝文的族長職務,並對其進行了肉體懲罰與精神羞辱。

其四是娛樂儀式。鄉土社會雖然在嚴重物質短缺與禁欲主義的雙重擠壓下,處在一種呆板而枯燥的狀態之

中,但無論如何,人類對精神享受的追求是任何外在壓力所無法泯滅的。作為這一社會的精英人物,白嘉軒必然擔負起供應這種公共產品的重任。白鹿原有一個戲台,白嘉軒不時組織一些草台戲班來此表演。無論是秦腔還是社戲儺舞,都給了白鹿原鄉民珍貴的精神享受與心靈慰藉。

(二) 朱先生：鄉土社會的精神象徵

在小說中,朱先生被賦予了白鹿原這一鄉土社會精神領袖的地位。作者在這一人物上寄託了他對儒家精神的無限懷念。如果說白嘉軒為鄉土社會提供制度支持的話,朱先生則給這一鄉土社會提供精神資源。鄉土社會的維繫與運作,必須建立在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基礎之上。朱先生為鄉土社會提供了三種類型的的精神資源:

一是地方性的知識。東方社會的知識是建立在對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總體綜合把握基礎之上的,注重對客體的定性分析和整體把握,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結構同一與功能互換。鄉土社會是一個沒有分化的整體,人對自然的認知程度較低。這種地方性知識,足以用來詮釋各種現象(自然、社會和人本身)。朱先生提供這種地方性知識體系的有效途徑就是辦學。這也是鄉土社會知識傳承的最主要方式。通過規範教育體系,將以經典文本為載體的傳統知識傳授給白鹿原的下一代,使白鹿原在物質、制度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同時,也在進行精神和觀念的再生產。

二是關於國家與民族的整體認同。小農經濟是一種分散的生產方

在小說中,朱先生被賦予了白鹿原這一鄉土社會精神領袖的地位。作者在這一人物上寄託了他對儒家精神的無限懷念。如果說白嘉軒為鄉土社會提供制度支持的話,朱先生則給這一鄉土社會提供精神資源。

在中國，鄉土社會的解體與現代理性建構，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一個伴隨着劇烈社會動蕩與反覆的過程。《白鹿原》對這一百多年的過程進行了文學的展示與描述。

式。這種分散的耕作方式對國家的依賴程度非常低，「民族」的觀念也無法形成，也就是說，鄉土社會與國家（民族）缺乏一種建立有機聯繫的動力。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控制力是很薄弱的。但中國為甚麼能維持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沒有分裂？為甚麼會有無數個相互無關的村莊相互聯繫成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原因就在於儒家文化在國家與鄉土社會之間建立起了一條有機精神紐帶，那就是以「忠孝」觀念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儒家知識份子是国家通過科舉這一機制向鄉土社會派送的精神統治者。每年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參與各種層次的科舉考試，真正進入國家體制內出仕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以秀才的身份回到了其鄉土社會，來充當國家

與鄉土社會的精神紐帶。朱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充當起國家與鄉土社會的文化經紀人^⑥，致力於傳播儒家關於國家民族的認知。小說中描寫了他多次參與政治活動的場景，意味着他具有非常強烈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觀念。

三是道德標準與行為規範。道德標準與規範不是天生的，並不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是一種先天美德，而是在後天的學習過程中不斷接受和強化的。對於大部分都是文盲的鄉土社會成員來講，必須有人給他們提供一種現成的道德標準與價值規範。這是儒家知識份子在鄉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與功能，他們提供的主要是一種處理鄉土社會人際關係的理論依據與技術標準。如果說，朱先生為鄉土社會提供的處理鄉土與國家關係的整體認知是「忠孝」觀念的話，那麼，他為鄉土社會提供的處理人際關係的價值規範則是「仁義」觀念。他通過各種渠道，傳播儒家仁義禮治的原則與標準，從而使白鹿村獲得了「仁義白鹿村」的美名。

(三) 鹿三：鄉土社會耕作者的代表

中國農民是鄉土社會的主體，其人格多樣性也就體現了鄉土社會的多重性。作為鄉土社會的維護者，他們提供的主要是物質資源。這是最重要的一種資源，因為沒有這一資源，鄉土社會的一切活動都無法展開。但人類社會的歷史往往就充滿着悖論，最重要的資源創造者和供給者，往往處於社會的最低層。儒家經典早就下過結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西安市白鹿原一景

鹿三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最主要代表，因此也是鄉土社會的重要支柱。鄉土社會的土地無論歸誰所有，都是由他們這些人來直接耕作的。他們具備了鄉土社會生產者必備的多重要求：較好的體力、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高超的耕作技術。

像鹿三這樣的勞動者，除了提供體力並將其轉化為全體鄉土社會所需要的物質資源以外，還是鄉土社會各種制度和精神規範的接受者和執行者。白嘉軒和朱先生這樣的鄉土社會精英，提供了制度與精神資源後，主要就是由鹿三這樣的鄉民來遵照執行。他們有時還充當鄉土社會道德秩序的捍衛者，對於鄉土社會的制度與精神價值的信奉程度，甚至還要高於那些制度規範與精神觀念的制訂者與提供者，他們對於鄉土社會的各種秩序與規範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熱忱，所以當有人破壞了這些秩序的時候，他們就非常堅決地予以制止甚至懲罰。鹿三毫不猶豫地處死了黑娃（鹿兆謙）的女人——實際是他兒媳田小娥，就是這種對鄉土社會制度規範與精神價值近乎偏執地維護的具體體現。

二 革命：現代理性的導入

在中國，鄉土社會的解體與現代理性建構，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一個伴隨着劇烈社會動蕩與反覆的過程，這一過程在中國持續了一百多年。《白鹿原》對這一百多年的過程進行了文學語境下的展示與描述。白、鹿兩家第二代人物的成長集中反映了這一過程。

（一）知識體系的更新：現代理性導入的理論準備

現代理性有着一套完全不同的知識（話語）體系。它建立在對自然、社會和人本身不同角度認識的本體論基礎之上。這種以古希臘、羅馬為基礎，經過工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有着與東方社會知識體系完全不同的內在邏輯結構和外在表達傳播方式，它引起了技術上的巨大變革，並極大地增加了物質財富，使之擁有主宰全世界的霸權。在其耀眼光芒之下，其他一切民族與社會的知識體系，變成了地方性知識而晦然無色。1840年後，這種知識體系隨着西方無所不摧的堅船利炮和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質商品傳到了中國，並迅速取得了比較優勢，對持續了幾千年的以儒家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知識體系構成了嚴重挑戰。

如前所述，在白鹿原，朱先生是中國知識體系的代表，並且成為傳承這一知識體系的中介，而提供地方性知識體系的重要方式與途徑就是辦學院。但是到了朱先生這一代，書院的存在愈來愈成為問題。西方式的知識體系與其傳承機構——學校，將朱先生的書院一步一步逼到牆角，朱先生所辦的書院由城裏撤到了鄉下，其學生子弟也愈來愈少，都跑到洋學堂裏去了。無論是徐先生的白鹿學堂還是朱先生的白鹿書院，最後都被西方科學知識體系的傳承機構即學校取代了。鄉土社會向現代理性的轉換過程，實際是從傳統東方知識體系向西方近代科學知識體系轉化開始的。具體來說，就是有一批人從傳統的教育體系轉向了近代的教育體系。

有趣的是，凡是到城裏的新式學校學習過的人，後來都成了鄉土社會的反叛者。相反，只是在鄉土書院學習而沒有進新式學校的青年，最後都成為鄉土社會的維護者或寄生者。

在小說的後半部，敘事的基本框架就是革命。《白鹿原》對於革命的描述，雖然沒有超越以前的作品，但將其放在鄉土社會向現代理性轉換的過程中，有着自己的獨特視角。

鹿兆鵬——這個小說中完美的革命者，肩負着推翻鄉土社會最重要使命的「英雄」人物，最初在徐先生的學堂裏，後又在朱先生的書院接受傳統中國式的知識體系教育，但他很快就被城裏的洋學堂所吸引，並帶着其弟鹿兆海離開了朱先生的書院，到城裏的新式學校唸書去了。這一跨越，是鹿兆鵬成為一個鄉土社會顛覆者和終結者的重要前提。從縣城學成歸來之後，他擔任了白鹿原初級學校的校長，一邊傳播現代科學知識，一邊進行革命活動。有趣的是，凡是到城裏的新式學校學習過的人，後來都成了鄉土社會的反叛者，如鹿兆鵬、鹿兆海、白靈。相反，只是在鄉土書院學習而沒有進新式學校的青年，最後都成為鄉土社會的維護者或寄生者：白孝文、白孝武是維護者，黑娃成了土匪（是鄉土社會的伴生物或寄生生物）。

（二）社會分化：現代理性導入的衍生

鄉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分化程度低，所有的人都存在於一個混沌的物質、文化系統之中，其空間共享程度非常高。這是由於農業社會的專業分工與社會化程度低所造成的。而以專業化和社會分工為前提的現代社會，必然引起社會的分化，社會群體之間的物質差別和文化差別愈來愈大。由於空間的分離和時間上的差序，因此引起了物質利益上的差異與文化心態上的對立。這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

白鹿原原本是一個內在和諧、人與人之間相安無事的村莊。作為族長的白嘉軒和作為長工的鹿三能夠「同

吃、同住、同勞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自從現代性嵌入了白鹿原以後，這種混沌與和諧的狀態就一去不復返了，白鹿原的分化形成了幾大對立的利益群體，整個白鹿原成了一個大舞台，各種利益群體在這裏上演了各種衝突的喜劇、悲劇和鬧劇。革命黨人的反正、農會運動的造反、白嘉軒的抗租、外族的入侵、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與恩怨情仇，都在白鹿原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三）政黨政治：現代理性導入的主要標識

在鄉土社會中，政治實際上是宗族性質的活動，長老團體是宗族的代言人和實際控制者。以白嘉軒為代表的長老團體，代表着包括鹿三、窮寡婦在內所有人的利益。在社會出現分化以後，以白嘉軒為首的長老集團的整合能力愈來愈低，日漸失去了白鹿原代言人的地位，而代之以群雄並起式的各色政黨人物代表，如田福賢代表着封建的軍閥集團的利益，鹿兆海代表着進步的國民黨的利益，鹿兆鵬與白靈代表着革命的共產黨的利益。而所有這些代表人物，都是從白鹿原這個典型的鄉土社會中走出來的，現代社會把他們原來在一個符號體系下、有着共同歸屬的人變成了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政黨政治的代表。

（四）暴力衝突：現代理性導入的途徑

在中國這樣一個結構高度嚴密和穩定的鄉土社會，現代性不可能是內

生，而是由外部植入（嵌入）的強制性變遷過程。在小說的後半部，敘事的基本框架就是革命。所謂「革命」，按照列寧的說法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革命是現代理性下階級衝突的最高表現形式。《白鹿原》對於革命的描述，雖然沒有超越以前的作品，但將其放在鄉土社會向現代理性轉換的過程中，有着自己的獨特視角。

從城裏的反正開始，白鹿原就被各種形式的革命所籠罩，先是革命黨人革了大清王朝的命，後來又有黑娃為代表的農民革命，接着又是國共兩黨之間進行着你死我活的革命，又有中華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等等。白嘉軒認為，革命就像烙燒餅一樣，把白鹿原這個原本平靜如水的鄉土社會，翻來覆去，來回折騰。白嘉軒簡單地把現代理性導入過程中的革命看成了歷代王朝更迭的鬧劇；他沒有也不可能認清，只有翻來覆去地革命，才能把一個像白鹿原這樣超穩定的鄉土社會，帶入到一個理性的現代社會中去，其性質與作用同歷史上周期性的農民造反有着本質的區別。

在革命中，充滿着暴力與殘忍，跟蹤、告密、暗殺是革命的表現形式，是現代社會階級分化與矛盾衝突的必然結果。這種特殊的社會關係模式，不僅僅表現在對立的階級與階層之中，也表現在一些階級和階層的內部關係處理上。白靈最後不是死在階級敵人的手上，而是被自己的同志密殺於階級隊伍的內部；黑娃最後被一同密謀起義的白孝文捕殺，不僅是革命中典型的個案，更表現出現代理性構建過程中的悲壯。

三 斷裂：糾纏的結果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必然存在着斷裂。這種斷裂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變遷的過程更加神速；二是變遷所涉及的範圍空前擴大^⑦。中國鄉土社會轉入現代理性的過程是一個相對短暫而激烈的過程。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理性轉換的過程中，產生的斷裂是如此的明顯。在《白鹿原》這一文本中，這一斷裂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權威的坍塌

韋伯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是具有權威的。這是一個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必要前提。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會中，權威的來源和類型有所不同，即神的權威（卡里斯瑪權威）、暴力型權威和認同型權威^⑧。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明顯存在一種卡里斯瑪的權威，全體社會成員服從在終極的混合性的神靈之下，維持社會的秩序。現代理性的嵌入，首先就是破壞了這種類型的權威。黑娃領導的農會首先將「仁義白鹿村」的牘匾用鐵錘砸得粉碎，實際上就是對這種權威的顛覆。它標誌着鄉土社會的權威在現代理性下的終結。傳統的卡里斯瑪的終結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這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但問題在於，傳統的權威顛覆以後，社會需要一個新的權威，應該重塑一個甚麼樣的權威？如何重塑這個權威？現代理性的構建者並沒有完全考慮清楚。

傳統的卡里斯瑪的終結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但問題在於，傳統的權威顛覆以後，社會需要一個新的權威，應該重塑一個甚麼樣的權威？如何重塑這個權威？現代理性的構建者並沒有完全考慮清楚。

鄉土社會與現代理性的反覆較量，呈現拉鋸狀態，雙方都沒有能夠取得主導人心的絕對優勢。其結果就是社會成員在認同、歸依、自我體驗與表達等方面無所適從。社會規範與評價標準混亂。

舊的已去，新的還沒有來。這就是斷裂。在白鹿原，先是皇帝為代表的龍權威的瓦解，導致「白狼」為代表的邪惡勢力猖獗，後是白嘉軒和朱先生為代表的權威坍塌，致令白鹿原人心惶惶，動蕩不安。從此，再也沒有一個權威來整合白鹿原了。朱先生未卜先知地預示了這種權威坍塌後的結果：無休止地折騰。他以此類推地預測了文化大革命——看似神秘，實則必然。朱先生是直觀推測，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是邏輯分析：現代理性的構建，如果不能很好地用制度權威來約束，那就是通往奴役之路^②。

(二) 記憶的中斷

在《白鹿原》的結局，陳忠實安排了兩個情節，讓白嘉軒和鹿子霖告別了過去：一是白嘉軒在當人民政府縣長的兒子——白孝文主持的鎮壓反革命的槍聲響起之後，突然昏迷過去，並從此失掉了一隻眼睛，往日作為族長的威風隨着一聲槍響而消失殆盡，黑娃最不願意看到的那既挺且直的腰再也直不起來了；二是白鹿原的另一個風雲人物鹿子霖，經過這一重大事件的強烈刺激，神經錯亂，最終失去了記憶。

這個記憶的中斷，是建立在「白鹿原上鄉民現存記憶中最浩大的一次」(頁627)之後，人們只記住這次最震撼人心的槍斃行為，它是近百年來，白鹿原上演的各種活劇的最高潮，也就是頑強的鄉土社會與迫切的現代理性糾纏的最高潮。在以前多次的雄壯活劇中，白嘉軒都是缺場的，「他對這類熱鬧從來缺乏熱情和好奇，寧可丟剝了衣服熱汗蒸騰地踩踏

軋花機，也不想擠到人窩裏去看耍猴的賣大力丸的表演，即使是幾十年不遇的殺人場合。鎮嵩軍槍殺縱火犯時，他沒有去；田福賢在小學校西圍牆外槍崩鹿兆鵬的那回，他也沒有去」，但這「最浩大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白嘉軒再也不能缺場了，他「一反常態地參加了這個聲勢浩大的集會」(頁627、628)。

心理學認為，一個人失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某種刺激，使得整個大腦中只儲存這個最強烈的信息，並將以前的信息全部或大部分清除(格式化)了。一個個體是這樣，一個群體也是這樣。白鹿原上的全體鄉民，經受了白孝文鎮壓反革命之後，全部記住了這一令人難忘的場景，以前的記憶消失了。而鹿子霖只不過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而已。

白嘉軒聽到黑娃被捕的消息後，親自向當了縣長的兒子求情並擔保。父子之間的對話在各自不同的語境下展開：

「我今日專意擔保黑娃來咧。」白孝文卻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該判就判，不該判的一個也不冤枉，你說的哪朝哪代的老話呀！」白嘉軒很反感兒子的笑聲和輕淡的態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義來嗎？容不下他當縣長，還不能容他回原上種地務莊稼？」白孝文突地變臉：「爸！你再不敢亂說亂問，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你亂說亂問違反政策。」屋子裏幹部出出進進，忙忙碌碌向白縣長匯報請示。白嘉軒還是忍不住說：「這黑娃學好了。人學好了就該容得。」白孝文對父親說：「你先到我宿舍歇下，我下班以後再陪你啊爸！」(頁627)

很明顯，雙方都在自說自話，根本就不在一個語境下。在白孝文這種強勢的現代性話語面前，只有弱勢鄉土話語的白嘉軒只能一頭昏倒在地，從此不再言語，而鹿子霖就只能神經錯亂了。

(三) 秩序的失衡

鄉土社會與現代理性的反覆較量，呈現拉鋸狀態，雙方都沒有能夠取得主導人心的絕對優勢。其結果就是社會成員在認同、歸依、自我體驗與表達等方面無所適從。社會規範與評價標準混亂。舊的已經被剝蝕，但硬核尤存，新的已經出現，但體質孱弱。這種文化結構下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失序的社會。鄉土社會和現代理性的糾纏中，白鹿原天災不斷、人禍頻繁、道德敗落、族群撕裂。「失序」呈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自然的失序

乾旱造成的巨大災荒，迫使人們尋找各種食物來維持生存，當自然能夠提供的食物及其替代品完全斷絕後，人們最後回到自身，通過吃掉同類來維持生存。原上一家人在晚上商量，父親說服兒子要他同意吃掉媳婦，媳婦嚇得躲回娘家；又聽到新生父母在商量，與其讓婆婆家的人把女兒吃掉，還不如自家人吃掉。這是自然將人逼到牆角後，人最無奈的回應。一切道德教條，在生存的需要面前，是那麼的蒼白與軟弱。

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莊裏蔓延，像洪水漫過青蔥蔥的河川的田畝，像烏雲瀰漫湛藍如洗的天空，沒有任何遮擋、沒有任何防衛，一切

村莊裏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窮人和富人，都在這場無法抵禦的大災難裏顫抖。

在《白鹿原》中，記載了兩次災害：一次是「白狼」。這不是真正的狼，而是一種化身為白狼的靈異。那是一隻純白如雪的狼，兩隻眼睛閃出綠幽幽的光，吞噬着原上的人畜。另一次是田小娥的冤魂。這實際上是由田小娥為代表的人性衝動（現代性的重要內容）和鄉土社會道德秩序之間的再次較量。

二、社會的失序

鄉土社會的綱常倫理規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中的等級與地位，並賦予了其特有角色特徵。這些特定的角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關係網絡，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稱之為「文化權力網絡」^⑩。而現代理性的導入，對這種文化權力網絡，形成了直接的顛覆與解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形成了利益關係，而這種利益關係，不再需要文化權力網絡來調整和維持，而是依靠契約來維持，但契約的精神與制度，不是在一朝一夕可能形成的。這就形成了制度的真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失範了。這在白鹿原幾乎隨時可見。夫婦隔離、翁媳相殘、父子對立、兄弟結冤，以及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仇殺等，完全破壞了鄉土社會那種父慈子孝、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社會結構。

三、心態的失序

鄉土社會的秩序是依靠每個成員的自我約束，而不是主要依靠外在的強制來實現的。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秩序的模式，而將這一模式外化，

近代以來，隨着以強大的物質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理性的導入，使得每個鄉土社會陷入了一種生存性的焦慮和緊張狀態，在白鹿原，無論是白嘉軒、朱先生還是鹿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種心態秩序失範。

鄉土社會與現代理性的糾纏，給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建留下了艱巨的任務。這種任務只有在工業化與市場經濟徹底洗禮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不過，這種洗禮同樣是長期而痛苦的過程。

就成了社會秩序。費孝通稱之為「心態秩序」。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之所以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每個鄉民都有一個穩定的心態秩序。而現代理性的導入，破壞了這種穩定的心態秩序，從而從根本上破壞了鄉土社會的外在秩序。近代以來，隨着以強大的物質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理性的導入，使得每個鄉土社會陷入了一種生存性的焦慮和緊張狀態，人們內心的平安不再^①。

在白鹿原，無論是白嘉軒、朱先生還是鹿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種焦慮與緊張，心態秩序失範。白嘉軒最後一次在小說中的形象是，他看見了鹿子霖的悲慘結局，「輕輕搖搖頭，轉過身時忍不住流下淚來。」(頁631)朱先生最後看到的是「荒蕪的田疇、凋敝的村舍、死灰似的臉色，鮮明地預示着：如果不是白鹿原走到了毀滅的盡頭，那就是主宰原上生靈的王朝將陷入死轍末路。這一切擺在那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無需掐算卜卦。然而朱先生自己再不能有一絲作為了」(頁582)。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朱先生就是在這種對時局的無奈之中撒手西去的。而另一個代表鹿三更是心先死而身後衰：「鹿三繼續退坡，動作愈顯遲疑和委頓，常常在原地打轉轉尋找手裏拿着攪料棍子或是水瓢。」(頁549)最後在一次酒醉之後無疾而終。

《白鹿原》的結局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缺乏系統的現代化理論準備和啟蒙運動，作為外生的現代理性在一個短的時期內很難真正進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而經常以一種非常態的形式出現，在「過」與

「不及」兩種狀態之間搖擺。鄉土社會與現代理性的糾纏，給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建留下了艱巨的任務。這種任務只有在工業化與市場經濟徹底洗禮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不過，這種洗禮同樣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

註釋

①①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7；52。

② 陳忠實：《白鹿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16。

④ 參見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4。

⑤ 關於龍在灌溉文明中的地位與作用，參見羅紅光：〈權力與權威——黑龍潭的符號體系與政治評論〉，載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頁339。

⑥⑦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頁66；4。

⑧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5。

⑨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45。

⑩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王明毅等譯：《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131。

謝迪斌 廣東工業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